

一、平津之战

1. 日军开了第一枪

公元 1937 民国 26 年,丁丑年,7 月 7 日 农历 5 月 29 日 星期 3 天气阴。

日正晦朔 白天不见日 夜晚不见月。当晚 天低云暗 夜幕笼罩着华北大地。天色如漆,人心压抑,寂静,沉默。宛平城门紧闭,城外的原野上偶尔传来几声犬吠,和演习日军的喊嚎。

山雨欲来风满楼,正是月黑杀人夜的天气。

6 月以来,驻丰台一带的日军不分昼夜地举行以攻夺宛平城为目标的军事演习。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指挥官和大部分幕僚,猬集在宛平城东的沙冈,对演习日军进行现场指导,并派遣部分辅佐官对丰台、宛平卢沟桥进行勘察。6 月 27 日 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了临时作战课。一时间 平津气氛恐怖弥漫 风声鹤唳 人心惶惶。宛平城附近的农民白天不敢下田耕作,田地荒芜。晚上早早关门熄灯,屏气忍愤。点灯人家也要用棉被将窗户堵上,唯恐遭到不测。

由于日军连日演习“密迩京师 八方通衢”的卢沟桥也变成了商旅不行,人迹罕至的地方。只有桥东“卢沟晓月”的御碑巍然屹立。御碑下 手持钢枪 身背大刀的第二十九军战士站岗 警惕地守卫着卢沟桥。

1937 年上半年过去了,中日关系似乎还比较平静,也就是说,还没有发生 9·18 事变以来时常发生的侵华战争和事件。在当时,日本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是多么的悬殊!战争侵略、妥协不抵抗,一方恶狼如狼;一方是怯如羔羊,只要这只恶狼不再提出贪婪

的要求，这只羔羊相对来说是平安无事的。

是年 2 月，广田内阁倒台，林銑十郎组阁。佐滕尚武外相以另一份面孔开始了对南京政府、华北当局和英、美等国的外交活动。林銑内阁对南京政府大肆鼓吹中日“经济提携”和“邦交调整”。3 月间，日本派出了以儿玉谦次为团长，由日本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的经济使团来华访问。儿玉表示，要调整两国邦交，改变对华政策，协助中国的统一与复兴，要求中国实行“合作”。4 月间，华北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邀请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和天津市市长张自忠赴日参观陆海空军联合演习，以求“亲善友好”。宋哲元以不能分身为由，派张自忠率代表团前往。行前，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等为张自忠饯行。到日本后，日籍顾问笠井丰藏亲自引路，表示高度友好，代表团每到一地，都受到官方面的热烈的招待。

与此同时，由松井石根大将率领的大型歌舞团来到济南，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及省政府委员举行联欢，日本歌舞团演出了许多慰问节目。韩复榘也举行了盛大的答谢宴会，款待松井一行，并召济南名妓陪酒，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开怀畅饮，歌舞升平，完全是一派“亲善”气氛。

这时，外相佐滕尚武也在欧美进行外交活动，以修补日本 1935 年以来日益疏远的日英、日美关系。

种种迹象表明，中关系似乎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善良的人对这个平静的春天感到惊奇；幼稚的人，对这个与往年不同的春天感到高兴；清醒的人，对日本的这种“转变”提出了怀疑。

美国的中国通拉铁摩尔曾对人说：“这太象 1931 年了，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使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见到一个九一八呢！”他进一步指出：“在这种年头里，没有人能否认国际间应当遵守诚意的时节，日本的外交却总是把凶鸷之鹰与和平之鸽交换地导演着的”。另一个美国人的看法几乎与拉铁摩尔完全相同，他就是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此人以沉着、圆滑、老练著称。他认为，日

本佐滕外交’只不过是扩张主义运动中一次周期性的退潮”。他‘坚信潮是在涨，而不是在落，重涨起来的侵略扩张运动的浪潮必定要比前的潮水冲得更远。……我得密切注意，要看今后几个月国家施政动向究将朝向何方，按常例，今后几个月一定有好戏看。在这里，总觉得有点象坐在火山上，不知道火山将在什么时候爆发，我则确信爆发的日子决没有过去’。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句俗语用在要在中国看戏和观潮的旁观者和南京政府当局者是恰当的，但用在哲人的身上似乎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哲人的眼光都是睿智的。中国另一个当局者的哲人比旁观者看得更清楚，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对当时日本的作为是这样说的：“所谓中日提携的宣传和某些外交步骤的缓和，正是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他更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佐滕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的面前”。他呼吁：“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

历史事件不是那位伟人先知先觉的，但伟人可以通过事实现象进行判断预测的。毛泽东讲话后整整两个月，7月7日夜10时40分，在宛平城东北日军演习位置响起一阵枪声。在万籁俱寂的夜空中，枪声是多么地刺耳，振憾着每一个人的心。它点燃了侵略者的欲火，也掀起了中国人民长时间被压抑、忍耐蓄久的怒涛，它也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

一桩历史事件的总趋向是必然的，但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可能是偶然的。

日本帝国主义以侵略、掠夺、灭亡中国为其既定国策。从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在中国土地上驻军以来，中日间任何一次事件、冲突不论其偶然性多少，都是必然性链条上的一环，每一环都可能成为日本全面侵华的借口。远的不讲，我们仅从1931年“9·18事变”以来，日本在中国土地上所进行的侵略事实，都可以看出：

1931年11月初，日军唆使汉奸李际春、张璧等组织便衣在天

津暴乱 制造了天津事件。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借口日僧在上海被毆,发动了对上海的军事进攻,战事长达两月之久。

1933 年新年伊始,日军发动了对山海关的进攻,占领了冀东重镇山海关;

2 月 日本关东军进攻热河;

3 月 日军向冀东长城各口进攻。

1934 年 6 月 8 日,日本借口驻南京副领事藏本失踪,酝酿事变。因同月 12 日藏本在明孝陵寻获,日本失去口实而未爆发事变。

1935 年是多事之秋。1 月,日本制造了察东事件;5 月 日军制造了热河事件;9 月,日本特务挑唆汉奸制造香河自治运动;12 月,日本制造冀察两省特殊化事件。

1936 年,日本更是步步进逼,其肇事活动由政治上的压迫变为赤裸裸的军事手段。1 月,演习的日军制造了朝阳门事件;5 月,在天津制造了“大沽冲突事件”和“金刚桥事件”。同月在北京丰台,日军挑起事端,强迫第二十九军让防;9 月,丰台日军又制造事端,第二十九军被迫让出营房;10 月 26 日至 11 月 4 日 华北驻屯军举行“秋季大演习”,日军以北平为假想进攻目标 以卢沟桥、宛平城为重要攻击点。参加部队近万人,演习范围达 4 万平方公里。北平近郊和天津等地的重要地区都有日军的铁蹄。

以上,我们惜于笔墨仅仅列举日军制造的大事,而未列的一些小事件任意列举出来一件,都不小于卢沟桥畔的枪声。

《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一个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刺痛着中国人民的心 忍让、屈辱、赔礼道歉,一件件奴颜卑膝的行为,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这种状况何时是终结?

东北沦陷了,中国上海不驻兵了,热河在日军的铁蹄下,冀东伪自治政府成立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欲望何时能满足?

我们看一看卢沟桥事变前北平的态势吧。在北平东部,通县有日本侵略者炮制的殷汝耕伪冀东自治政府,和唐山的陶局铭伪自

治政府。从京东到山海关广大地区内驻有日军和傀儡政权的伪军在北平北面，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了百灵庙德王的伪蒙疆自治政府。并侵犯冀北地区。平北平绥线上的咽喉——南口 由于被冀东伪军所掌握，日军随时都可以由古北口通过南口向北平进犯。在北平东南方向，日军强行霸占了丰台镇，使丰台成为进攻北平的前哨阵地。北平对外的通道只剩下西南角的卢沟桥了。日军三面兵临北平城下 使北平成为围棋盘上随时“叫吃”的一个子。日军占领了卢沟桥，北平与外界的沟通将完全断绝，平津将成为日军的囊中之物 继而进可攻取华北平原 威胁山西。对于中国方面说来“卢沟桥之得失，北平之存亡系之；北平之得失，华北之存亡系之；而西北 陇海线乃至长江流域 亦莫不受其威胁也”。为此 卢沟桥成为众人注目的地方，成为日军夺取的重要目标，成为中国军队固守的要点。必须死守。“为北平存留着这条唯一的气管”。

由此可见，日军在卢沟桥制造事变是必然的了。

2. 战？还是不战

7月8日。

夏日的庐山 江湖水气郁结 云海弥漫 远远望去 五老峰高耸 横岭侧峰 云雾缭绕缥缈 不识真面目。跃上葱笼 万木青翠 才见柳暗花明，一个清凉世界。

清晨 清风徐来 抹去淡淡云雾 使人心旷神怡。这里与骄阳流火、热浪灼人的南京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为躲避南京闷热的天气 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马弁随从每年都象候鸟一样来到庐山，享受这清凉的生活，呼吸这新鲜的空气，待到秋来江南稻熟鱼肥才快快而返。

7 时许 日上三竿 人们刚刚起床。文官们揉着惺松的睡眼 仔细地擦试眼镜 懒懒地走到房外 伸展着因伏案劳作而未休息过来的腰身。武官们则早早起床 或伸胳膊踢腿来套拳路 或使枪弄棒打一阵武术。这里没有流民的扰乱 没有学生的请愿 更看不到赤

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的农村，完全是一个世外桃源。

庐山的主人是蒋介石，众文武官员象众星拱月围着他转。蒋介石偕宋美龄住在一幢西式小楼里，这所房子虽不是雕梁画栋，但设计得别致得体，为宋美龄青睐。夫人满意，皆大欢喜。宋美龄常以陶潜诗“吾亦爱吾庐”誉之，蒋介石周围的文人颇费心思地为这栋房子起了个“美庐”的雅号，很得夫人的欢心。

蒋介石起居有序。他早早地起了床。宋美龄还在拥衾酣睡，他已蹑手蹑脚地穿上睡衣，轻轻地打开半扇窗户，向远望去是云蒸雾霭的鄱阳湖，近处是一片树海，薄雾从树丛中沁出，象刚掀开的蒸笼。眼前是这所楼房的院子，十几亩的大院，花香树茂，清洁而又雅致，鸟儿在树上花下追逐嬉戏。无论是环境还是气候，这儿都象他的家乡奉化，这所院子和他归乡常住的雪窦寺也十分相似，对此，他感到十分惬意。

更使他高兴的是，庐山对他来说是风水宝地。在这里，他指挥几十万大军将红军从江西赶到了陕北。李宗仁、陈济棠的反叛活动在他的手下也烟消云散……想到此，他踌躇满志。正在这时，宋美龄翻了个身，他回头看了看熟睡的宋美龄，瞥见了放在床头柜上的假牙，使他想起了西安华清池那一幕，心中顿时充满了苦涩、气愤乃至仇恨……，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上午 10 时，侍从参谋送来了常驻北平的军政部参事严宽向部长何应钦的报告：“昨夜日军强迫侵入卢沟桥镇，遂与我驻卢部队发生冲突”。并报告了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的看法：“日军示威多日，此次在卢发生冲突，系日军有计划行动，我军士气极盛”。云云。几乎在此同时，外交部也报告了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

蒋介石听到报告，感到事发突然。他曾预料日军在华北迟早要肇事，但没想到来得这样快。事变既已发生，他感到事非寻常。

蒋介石继西安事变时表示停止“剿共”，联共抗战等议定的六项条件后，又在 2 月 15 至 22 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停止“剿共”内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中央也在致

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报中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点保证 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等与国民党代表宋子文等就两党合作抗日的事进行谈判，这表明国内内战已经结束。

内战结束 使得蒋介石专心考虑抗日的问题 但他又被上半年日本派来的这个访问团、那个考察团所迷惑 虽然平津方面不时报告日军进行演习的消息 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在有关的场合 甚至当着蒋的面指出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迫在眉睫。蒋介石都是将信将疑。现在卢沟桥事变既已发生 蒋介石深知该地区战略价值。他令侍从室主任钱大均召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和军委会所属有关部负责人来海慧寺 军政部长何应钦到重庆主持川军整编 军政部则由俞飞鹏代理。他要外交部摸清日方的动向企图 及各国对此事的反映 令军委会第二厅认真搜集事变后日方的情报 并注意国内各方 特别是共产党方面对此事的反应。蒋介石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度过了这一天。

7月8日清晨。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关东军司令部，日本法西斯分子一个个象吸食了海洛因 战争的狂热使他们兴奋异常 弹冠相庆。九·一八事变以来 侵占东北 进犯热河 进攻长城各口 兵临平津城下 再犯绥远 攻城掠地 关东军几乎都是打头阵。事变一发生 他们认为，关东军再显身手的机会到了。

一大早 关东军司令部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目前北方（指苏联）是安全的 所以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会议决定，“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主力及空军部队一部作好立即出动的准备”。随时听令开赴华北参加作战。

当日 18时 10分 关东军发表声明表示 对卢沟桥事件“保持极大的关心和坚定决心 严重注视着事件的发展 同时 关东军司令部派遣高级参谋田中隆吉和辻政信到华北驻屯军陈述强硬意见 支持其武装进攻行动 要求两军联名向日本国内提出意见。辻政信还跑到卢沟桥前线，煽动华北驻屯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

说：“关东军支持你们，彻底地扩大下去吧。”

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得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立即向参谋本部报告，并表示：“已以第二十师团的一部作好随时出动的准备”。并强调扩大战争，以“利用这一事件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

1937年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放出“中日提携”的烟幕下，紧张地进行战争准备。2月20日，外务省制订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声言要“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4月中旬，日本政府又召开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相会议，密谋侵占华北。6月9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写给日本大本营的奏折中指出：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的中国局势，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东条英机的战争叫嚣不是偶然的，是和当时日本国内的战争气氛相关连的。

当时的日本，战争的空气甚嚣尘上。在东京，歌舞剧院在上演歌颂复仇和暴力精神的《忠臣藏》，电影院则大肆放映以1932年进攻上海为内容的电影《炸弹三勇士》。日本军方为了表彰这三个“侵华英雄”，特提其升二级并授予金鸡奖章，同时为其举行了街村葬礼，为他们树立了铜像和纪念碑，不遗余力地煽动军国主义侵华狂热。

8日晨，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在日本内阁和军部内引起一阵争吵，在选择侵华战争的时机问题上，日本法西斯军人内部存在分歧，由此分成“扩大派”和“不扩大派”。

扩大派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和参谋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等人代表，人数较多，他们大都参加过侵略中国的活动，为日本侵略中国立过功，他们认为中国的当权者都患有恐日病，“确信对中国只需拔刀威胁一下，它就会屈服”。他们扬言：只要日本造成动员声势，满载兵员的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就会投降。另一部分人似乎还留点余地，断言“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充其量不过是进行一次保定会战就完事大吉了”。杉山元在给天皇的奏折中曾狂妄地宣称：“中国事变用一个月就解决了”。他们认为，国际形势也有利于

对中国的侵略 美国不大注意远东 英国受到德国的牵制 无暇东顾 苏联也不会干预日本的行动 卢沟桥事变 是千载一逢的良机，此时还是干为好”。

“不扩大派”与“扩大派”的区别只是头脑发热还没有发昏 主要代表人物为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和战争指导课主任参谋堀场一雄等人。他们认为 目前不是扩大战争 而是巩固在中国的侵略成果，不失时机地开发满洲，利用中国的资源兴建大工业。待到积存有战费 50 亿日元 能动员 15 个师团，同时动用军需动员准备量的一半时，再利用半年的时间，把作战地域扩展到黄河以北 视情况可包括上海方向 如果现在就扩大战争 中国会举国一致发挥较强的力量 日本就会陷入长期持久战 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因此 他们主张“此刻宜慎重从事 不可陷于武力纷争”。

但此时日本执政的是 6 月 4 日上任的近卫文麿在其内阁中的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正、外相广田弘毅、藏相马场英一等都是军部所要求的“革新派”且掌握了内阁中的实权。“扩大派很快占了上风”。

当日 参谋本部开始制订向华北派兵的计划 准备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 从朝鲜抽调一个师团 从国内派遣三个师团到华北作战。当日深夜 陆相杉山元下令 京都以西各师团 原定于 7 月 10 日复员的步兵联队 2 年兵延期复员。同时，海军部也下令进入警备状态，以备对华紧急出兵。日本扩大对中国侵略已非常明朗。

7 月 8 日凌晨。

宛平城边枪声响起后，中国代表、宛平县县长王冷斋面对日军的无理纠缠、挑衅、威胁、武力恫吓 依然是精神抖擞、斗志不减 无半点倦怠。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据理力争，全副武装的日军代表在他身上得不到任何东西。

日军见交涉、威胁无效 于 5 时 30 分向宛平城的中国守军进行炮击，继而向卢沟桥、龙王庙和铁路桥东头发起了进攻。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 第二十九军的将领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召开紧急会议 会后发表声明：“彼方要求须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 方免事态扩大 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 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 为正当防卫计 当不得不竭力周旋。”同时 第二十九军向防卫卢沟桥部队发出命令：“卢沟桥即为尔等坟墓 应与桥共存亡 不得后退。”

守卫卢沟桥的部队为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旅长何基沣根据军部命令又向守桥部队下达了三条命令：一、不同意日军进城；二、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 决不退让 放弃阵地，军法从事。

日军三大队主力在大队长一木清直的带领下排成四路纵队，气势汹汹地向龙王庙和铁路桥中国守军扑去，扬言要在中国军队驻地搜寻“失踪士兵”。中日双方在龙王庙附近遭遇，守军排长申仲明站在桥头，拒绝日军的无理要求，日军早已准备，突然开枪射击，申排长壮烈殉国。

申排长的牺牲激怒了二十九军的战士，为保卫祖国领土，捍卫民族尊严，奋起反击自卫。守军两个排的战士面对九百名日军毫无惧色，几十支枪喷射出复仇的怒火。当敌人冲上阵地后，战士们又轮起大刀，冲入敌群，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14分钟后，终因敌众多寡，两个排的战士几乎全部战死在铁路桥头阵地上，日以死亡上百名士兵的代价，占领了龙王庙和铁路桥东头。

与此同时，另一部日军向宛平县城东门发起了进攻。侵略者用大炮轰击城墙。炮弹呼啸着飞过城墙，炸毁了营指挥部。

日军为继续发动新的攻势。7时30分，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对驻天津的各部队下达了准备出动的命令，并命令在秦皇岛检阅部队的河边正三旅团长马上返回北平，决心扩大战争。

9时，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在卢沟桥的牟田口率部占领永定河以东，并将由天津经通州到北京的部队由其指挥，增援部队为：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战车一中队、炮兵第二大队、工兵一个小队。

牟田口接到命令 即于 9 时 25 分命令副联队长森田指挥一个大队兵临宛平城下，进行武力威胁，要求中国守军退到永定河西，如果需要，即占领卢沟桥。森田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守军的严厉拒绝。森田见威胁不成，便令部队攻打宛平，守军用猛烈的射击，表示了与宛平城共存亡的决心。

13 时，牟田口从北平到达宛平城东北的沙冈前线，亲自指挥作战。15 时 30 分，河边正三旅团长也赶到丰台督战。但此时日军在丰台地区兵力相对少，河边正三一面命令第三大队在龙王庙附近，在已占领铁路部队的掩护下渡过永定河，一面以谈判为幌子等待援军，待援军到达后再于 9 日进攻宛平城。

8 日晚 几天来阴暗闷热的天气 酿成了一场大雨。入夜 细雨蒙蒙，夜幕笼罩的战场一片沉寂，大雨过后的高粱、玉米叶子挺拔、绿得发亮，象千万把挺立的钢刀，使浓密的青纱帐显得神秘、深不可测。

就在这时，由吉星文团青年战士组成的突击队，用绳梯缒出宛平城 在青纱帐的掩护下 沿永定河堤向铁路桥靠近。连日来 日寇蛮横的侵略行径，使战士们达到了极度的悲愤，他们简直要发疯了，如若再不要他们冲出城去刺杀日本兵，他们简直要自杀了。出城杀敌的命令一发出，有的战士竟等不得用绳梯，便飞跃下城，恨不能把日本兵一扫而光。

夜 12 时。

大雨过后 永定河波涛滚滚 向东南流去 蛙声响成一片。

占领铁路桥和龙王庙的日军，有的随地而卧，有的抱枪瞌睡，他们在梦想着天亮换防休息，或继续向永定河西发起进攻。

突然，吉星文率突击队如神兵天降，大刀闪着寒光，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有的还未清醒 就身首异处 有的还作抵抗 猝不及防便成了刀下鬼。日军在铁路两边狼奔豕突，东奔西逃，逃不走的就跪地求饶，一扫过去那不可一世的皇军神态。一位年仅 19 岁的突击队员 竟手刃日军 13 人 生擒 1 人。突击队硬是用手中的大刀，

将日军一个中队全部砍杀在铁路桥上。突击队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近四分之三。事后，一位突击队的伤兵回忆当时的战斗场面说：“弟兄们将敌军打败后，还拚命地追杀过去，集合号也不能把他们集合回来，结果，还是官长亲自把他们叫回来的。因为我们有命令，只死守，不准进攻。但这情形好象猎犬追赶兔子一样，是一个无法抑止的行为”。

9日凌晨，第29军完全恢复了永定河东岸的态势，减少了对宛平城的威胁。尤其是第二十九军官兵不负国人愿望。民心因之兴奋，军人为之振奋。

3. 庐山真面目

7月9日 庐山。

一天来，各方面的情报都汇集到庐山的侍从室，再由侍从室整理转送到蒋介石处。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心中十分不安，他不时在房内来回走动，或站在窗前凝思，侍从室的人员深知他的脾气，行动特别小心，讲话也察颜观色，低声下气的。但蒋心中焦急，他急于了解卢沟桥事变的发展动态，摸清日本的企图。他不时地朝门外看，希望来人向他汇报华北方面新的情况。

华北问题对于蒋介石来说，实在是重要的问题。尽管一年多来日军在华北没闹出大的事，宋哲元一面信誓旦旦地表示拥护蒋介石，费尽心机地与日军周旋，使他还比较放心。但他下意识地认为，日军迟早要在华北肇事，虽然确切的日期他不能预定。

1930年中原大战后，东北和华北是张学良的天下。1931年9月18事变发生前，蒋介石认为日军不会占领东北，下令“不抵抗”。待到东北全失，又寄希望于国联停调。尽管东北沦陷后，民怨鼎沸，但对蒋介石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东北丢失了，阎锡山又卷土重来，山西张学良的力量得到削弱。蒋介石很清楚，他这个年轻有为、性格倔强、有独立思想的小兄弟，如果让他掌握着整个东北、华北，一

旦羽翼丰满，说不定哪一天又是与自己抗衡的力量。9·18事变后，他背着‘不抵抗’的黑锅，寄居在华北，光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和流亡到关内的难民就够他头疼的了，那还有力量与自己抗衡。

1933年2月，热河全省沦陷，张学良被迫下野。日军进而进攻长城各口，蒋介石令部分中央军北上参加长城抗战。5月，长城抗战失败。《塘沽协定》签订后，冀东二十二县不保，张学良不仅声名狼藉，而且他在华北的统治彻底地完了。国民党进入了河北、天津、北平。中央军的力量进驻了华北。国人骂也罢，部下（包括中央军）有意见也罢，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不会变的。

蒋介石的‘安内’的对象不只是共产党，除了共产党凡是同他的中央搞独立、闹别扭的地方实力派都在‘安内’之列。《塘沽协定》不仅使中央的力量临进入华北，还以妥协满足了日本一时的要求，换来了暂时的“安定”，使得蒋介石集中力量对红军进行“围剿”。

但日本侵略者不是中国的反蒋势力和革命力量，阎于墙的兄弟和登堂入室的强盗毕竟不同。日本侵略者欲壑难填。1935年5月，日本以武力相要挟，迫使国民党屈服，取消了国民党河北、北平和天津的党部，强令撤退驻河北和天津的中央军、宪兵和东北军，撤换了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平津两市市长，勒令国民政府驻北平当局取缔反日团体和反日协定等。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请示汪精卫，汪同意了日本的上述要求，这即是世人所说的‘何梅协定’。但蒋介石不同于汪精卫，“何梅协定”的签订是蒋的一块心病。6月9日，他在给汪精卫的电报中说：“中央军如南移，即与迫我放弃平津同一意义”。因而他极力反对从华北撤退中央军，认为应当拒绝日本的要求。他指出：“顾中央军一旦撤退，则两广更有辞可借，发动开府，内外交逼，是时我对国际固难措手，对民众则大失信仰，诚益陷入窘境，无可为计矣。弟考虑再三，认为撤退问题实最重要关键，应决定拒绝，不能接受”。

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态度很坚决，华北丧失，对他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它不单是一个地区的丧失，还有可能导致国民政府的垮台和中国的分裂。对于蒋介石来说，更严重的是直接影响了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稳固和推行。

但是对于极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除了对日本进行妥协让步外，别的无计可施。6月10日何应钦口头答应了日本的全部要求。同日国民政府公布《邦交敦睦令》严禁反日的言论和行动，严禁缔结反日的团体。蒋介石似乎不甘心，他令外交部同日本进行交涉，日本广田外相的答复对他的打击更大，提出了中国政府应当同驻屯军军部交涉处理，这不仅拒绝了中方进行外交交涉的提议，而且广田根本不把蒋介石等放在眼里，把国民政府降为一地方权力，公开侮辱蒋介石。蒋悲愤绝望之后，他于6月21日给何应钦的电报中说：“华北实已等于灭亡”，今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蒋介石对日本的妥协已达极限。

1935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上发表演说：“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此言不仅是告诉国人而且也是说给日本人听的。即中日之间的关系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是有的，同时妥协是有一定限度的。关于何为“绝望时期”何为“最后关头”这个“度”只有蒋介石心中清楚。

卢沟桥事变既已发生，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否是和平已经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他还无法断定，因为他对日军制造事变的意图还不明了。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

晴日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雾中的庐山更使人面目难辨。蒋介石如同面对迷雾中庐山中使得他对日本的真面目一时难辨。明眼人高屋建瓴，洞若观火。蒋介石虽不是明眼人，但是身在其中，无论事态的发展前景如何，他必须对事变作出反应：下午，外交部

次长陈介约见日本使馆副武官大城户三治，向日方提出口头抗议，劝告日方停止军事行动。

7月8日晚。

侍从室向蒋介石汇报了共产党方面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于7月8日向全国发出通电，通电向全国疾呼：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

通电号召“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同日，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为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侵犯华北致电蒋介石，要求“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志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同时，红军将领还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等，高度称赞其“处国防最前线，不畏强暴，奋勇抵抗，忠勇壮烈”，并表示“誓为贵军后盾”。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将领的通电、致电，态度明确，意志坚决。使摸不着日本意图的蒋介石为之振奋。但他又觉得共产党有点小题大作。日本会大规模地进行侵华战争吗？现在能象共产党所说“实行全国总动员”吗？这样做会不会刺激日本？蒋介石带着满腹的疑虑，度过了这一晚。

4. 蒋宋之间

乐陵，这个出金丝枣的鲁北小县，自从出了宋哲元这个大人

物 名声一时鹊起。

对于在外的游子来说 故乡是归巢 对宋哲元来说又多了一层意思——避风港。辉煌的业绩 耀人的头衔 固然光宗耀祖 为桑梓增色 但案牍的劳累 乱耳的丝竹 也使人心烦憔悴。

宋哲元于 1907 年离乡从戎。1932 年 3 月 曾为安葬父亲灵柩才返乡 安葬甫定 便匆匆返回军中。

1937 年初，冀察政务委员会内的亲日派，胁迫宋哲元向日本让步 华北驻屯军更频繁地提出种种无理要求 对宋滋扰不休 极尽威胁、恐吓之能事 并且怂恿汉奸向宋哲元施加压力。宋哲元痛苦不堪，产生了回乡回避的念头。1937 年 2 月上旬 他对副军长秦德纯说：“日方系以我为交涉对象 如我暂离平津 由你负责与之周旋 尚有伸缩余地 我且相信你有适当应付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 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 你意见如何？”秦德纯当即表示不同意 他说：“此事绝非个人荣辱苦乐问题 实国家安危存亡所系 中央把责任交给你 不论你是否在平 责任总在你身上 因此我决不赞成你离开北平。”宋哲元只好把回山东的打算暂时搁置起来。

到了 5 月中旬 日军压迫更甚 交涉益繁。宋哲元心情恶劣 心中苦闷 食不甘味 寝不能眠 惟恐小不忍乱大谋 于是决定请假回乡。行前 他把军事委托给冯治安 对日交涉则由秦德纯代理。他授意秦德纯：“对日交涉 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不接受，为避免冲突亦不拒绝。”5 月 11 日 宋哲元以省亲扫墓之名离开北平，回故乡山东乐陵。

和北平日军的纷扰比较起来 乐陵是个平静的港湾 宋哲元象一个久经风浪的小船 划进这里休整。宋的家乡 赵洪都村同一般农村一样 草房茅舍 泥路土墙 连公路也没有 但宋可以从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中，了解北平的情况和国内外的大事。

1930 年的中原大战，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冯部各员大将有投降了蒋介石 有的下野当寓公。宋哲元和张自忠、萧振瀛等集

中退到山西的残部，周旋于蒋介石、张学良间，成立了第二十九军，保存了西北军这支香火。

初编之时 蒋介石时刻想把这支部队南调‘剿共’。宋哲元十分厌烦内战 他心中十分明白 南调‘剿共’的下场 要么是在‘剿共’内战中消耗掉，要么被蒋介石编并吞食，因而想方设法敷衍推拖。

1933年春天的长城抗战，使蹙于山西的宋哲元时来运转。战前 他深知此战的意义 向各师传达了三点指示：（一）此次作战死亦光荣 无论如何要拚命作阵地；（二）不求与十九路军在上海作战之声威 而求日本人不能小看我们；（三）国家存亡、本军存亡 在此一战”。并写下了“宁为战死鬼 不做亡国奴”和“有进无退 死而后已”的手令激励部下。喜峰口、罗文峪两次大捷，使日军尸积如山，闻风丧胆。二十九军的胜利 对中国人来说 是热河失陷后“万人焦急一佳音”。当时日本一家报纸说：“明治以来 皇军荣誉丧尽于喜峰口外 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日支（日中）、日露（日俄）、日独（日德）历次战役胜利 攻取之声威 均为宋哲元剥削净尽”。宋哲元“被誉为抗战之民族英雄”。

长城抗战之后，第二十九军得到扩编。特别是1933年秋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宋哲元收编了抗日同盟军、在察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和溃败到热河的汤玉麟部，使其实力大增，共计近50个团。

在当时，顺潮流，得民心者唯有抗日，宋哲元率二十九军奋力抗日，不仅在华北站稳了脚跟、壮大了声誉，而且还扩大了队伍。

历史给宋哲元第二个机会是“何梅协定”的签订。长城抗战之后，第二十九军驻防在察哈尔。察省与热河接壤，察东边境不断遭到日伪的袭扰，第二十九军对进犯的日伪军和不法的日本特务给予回击，日本趁机向南京政府和北平军分会施加压力，制造了察东和张北事件。国民党当局以二十九军屡次与日军冲突，给其惹下了麻烦 于1935年6月8日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并拟将第二十九军南调。恰在这时，发生了白坚武匪武装进攻北平和“何梅协定”的签订。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撤退，一时间华北出现权力真空，